

# 福建宋元建筑研究

谢鸿权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福建宋元建筑研究

谢鸿权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宋元建筑研究 / 谢鸿权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112-19957-0

I. ①福… II. ①谢… III. ①古建筑—研究—福建—宋元时期 IV. ①TU-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713号

本书是福建宋元建筑的建筑学研究成果, 主要是以宋元东亚文化交流为背景, 通过细致深入的建筑样式分析与比对, 梳理作为东亚建筑重要一环之福建, 其建筑的典型地域特征。

宋元时期的福建建筑, 建筑构架上, 独特的材枋格线对位现象, 受到穿斗做法的较多影响, 以及采用较为发达的柱间联系; 构造节点上, 在铺作配置、角部梁枋、昂之使用、承檐构造、承脊构造等节点, 以及构件层面上的月梁、梭柱、丁头栱、皿斗、栱端曲线处理等样式, 对比同期中国大陆其他地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却与朝鲜半岛柱心包建筑、日本列岛大佛样建筑有一定的关联。

宋元时期福建建筑, 从构架到构件层面, 都反映了一定的独特性, 其地方特色已然定型, 并且还通过已被证实的佛教文化、海商等媒介, 流播影响过东亚其他地域。

本书可供建筑理论、建筑设计以及文物保护等相关领域人士, 高等院校建筑学、历史等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责任编辑: 唐旭 吴绫  
责任校对: 陈晶晶 李欣慰

## 福建宋元建筑研究

谢鸿权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sup>3</sup>/<sub>4</sub> 字数: 250千字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ISBN 978-7-112-19957-0

(2927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自序

原本想请张十庆先生来写序言的，在他指导下的研究，奠定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只是顾虑张生素来好静不喜受扰而未敢请序，索性就自说自话了。在福建建筑研究上，张先生算是我的第三位导师，而之前在福建多地调研、测绘、学习古代建筑的过程中，即有幸得到了方拥、曹春平两位先生的提携引领，两位老师对我不弃鄙陋，亦师亦友，春风化雨。

本书原稿大体完成于2010年，五年多来迟迟没有刊发，或源于本人对建筑历史的理解有所调整。其一是对古代建筑的关注点拓展到了古代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对实物案例的热情有所克制；其二则是对建筑样式分析体系的犹豫，尤其是对缺少年代精确定位的样式分析要做出明确的谱系列举与陈述，有所忐忑与怀疑自是必然。事实上，考古、精细测绘等新出发现已经在对已有陈述带来扰动乃至颠覆，最为触动的案例是天津大学的同行们在蓟县独乐寺山门的研究中发现，在以往历史陈述中一直被视为单独构件的四椽楹实则是前后两段构件对位相接而成，如此，以往由此而阐发的结构明晰等特征阐扬，岂非要重新书写？

所幸的是，在拙文所涉领域，时有关注下的新近成果，似乎尚未对拙文有太多冲击。当然，这最是受惠于福建先民的哲匠们，他们大量采用了石材构件，减少了后世的更换频幅，使得他们手泽摩挲过的样式有可能跨越漫长时空，仍清晰地展现于今日。这部书稿，也算是对他们营建智慧、营造技艺、审美意趣的部分展现，并因此可能具有了刊行的价值，而且可以算是唯一的理由了，尽管这个展现是如此菲薄与粗浅。

对原稿的大量删改也由此展开。为了更聚焦于福建建筑的特征展现，原稿有关东亚地域内宋元时期各营建体系的比较分析与讨论，大约三四成篇幅，尽数抛却。如此一来，文字结构或更为整体，更为集中于从构架、构造、构件三个层面记录福建建筑的主要特色，相关的必要比较与讨论，也始终围绕此主干展开。如此的安排，也是希望通过更简短的阅读，更紧凑的资料梳理，将福建宋元时期的建筑成就更好地加以推介。至于更为高明的研究与分析，或留待以后的研究者了。

# 前 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前辈们开展民居调查，福建建筑纳入建筑科学研究的版图以来，有关福建建筑的地域特色就渐为学界所识；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立足地方特色的武夷山庄等建筑作品的成功，福建建筑作为地域建筑研究的一方，更是备受关注。有关研究也从案例采风、单体分析等素材积累，发展到民系梳理、匠系工艺寻踪、文化交流载体辨析等视野拓展，而这些成果在开创福建建筑研究新领域的同时，也对福建地域建筑体系的完整性、历史渊源、样式特征等认识提出了期待。换言之，今日人们所认识的福建建筑，在宋元时期等更为久远的时代，是怎样的状况和样貌？部分揭示与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为了更为贴近宋元时期的时代性，研究中选取案例以 10~14 世纪的实物案例为主，基本上包括了目前所知的绝大多数相关建筑资料。然而不得不说，尽管留存有国内其他区域罕见的多座仿木石构建筑，相关的资料仍难称丰厚，怎么办？仍然回归历史的语境，众所周知，宋元时期的福建曾作为东亚海上贸易圈的重要一环，也是建筑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源流地之一，如此一来，作为接受福建建筑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地域的建筑案例，也就有可能作为探索斯时福建建筑的参照系了。机缘巧合，在 2008~2009 年间游学韩国获得了现场考察柱心包众多案例的机会，同期外派日本的同学代为收集了日本相关案例的维修报告，虽所费不菲，也算成全了落笔的底气与信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面对大量案例的梳理了，文献查阅、现场调研表格分析、样式的抄绘描摹等传统建筑研究的方法，所得成果，最后都提炼、落实到构架、构造、构件三个层面的体系中，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完成了宋元时期福建建筑的样式梳理。这样的成果，无论是作为福建地域建筑后续探索的奠基资料，或者是针对宋元时期案例的保护修缮工作的参考，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就本研究而言，研究论述立足于已有资料，数量有限，加上相关资料往往详略不一，有的案例有完整测绘，而有的资料则图片寥寥，无疑影响了论述的准确性，疏漏在所难免，这是其一。其二，研究集中关注样式分析，而对设计数理、材料工具等相关事项落笔甚少，以后应当加强，以达到更高的深度。其三是当年赵辰老师讨论本研究时所提出的有关建筑史范畴下的东亚思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研究范式，这也是我至今耿耿、仍在追问求解的问题。本研究的刊发，就算是对自己学术征程的再一次鞭策和鼓励了。

# 目 录

## 自 序 前 言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二章 福建宋元时期木构架探析	020
第一节 福建宋元时期木构架类型	020
第二节 福建构架主要特征	029
第三节 串——柱间联系构件	052
第三章 福建宋元建筑典型构造	068
第一节 铺作配置	068
第二节 角部梁枋	084
第三节 承檐构造样式	086
第四节 昂的使用	092
第五节 承脊构造样式	098
第四章 建筑构件典型样式分析	103
第一节 月梁之制	103
第二节 梭柱与瓜楞柱	109
第三节 丁头拱、插肘木与半檐遮	111
第四节 昂嘴曲线	115
第五节 斗拱形制	118
第五章 福建建筑的地域性	127
第一节 地域视角探析	127
第二节 福建建筑地域性分析	128

第六章 东亚的福建建筑·····	137
参考文献·····	142
图目录·····	148
表目录·····	154
附录：宋元福建、柱心包、大佛样实例举要·····	155
后 记·····	163

# 第一章 绪论

大明弘治二年（1489年），年已五旬的黄仲昭在亲力编撰的《八闽通志》序中写道：“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先哲凋谢，典刑日远，土习民风，渐不如昔，此有志于世道者所为深慨叹也。”两年后，黄氏好友彭韶在受邀而作的序中慨叹：“嗟呼！闽于天下为弹丸黑子之地，其事若省约；然自古迄于今，疆理、民俗、人才凡三变，非纪述之详何以究同异、验升降而可资以为因革之政哉？”<sup>1</sup>

六百年前的两位文人不约而同地道出了福建文化研究的普遍心态：虽处于非中心的偏僻疆域，然而福建文化亦曾昌盛，其文化的演进及同异升降亦具有引人探寻追问的价值。如此的心态与情绪，绵延不绝地出现在日后层出的研究文献中，流露于诸多福建文化研究者的笔端，几乎是所有福建文化关注者不息的共鸣。作为生长于斯的后学，自然不能置身于此种赓续数百年之历史的召唤之外，加之专业修习方面，力图了解和探析福建建筑历史演进和发展的愿望，共同促成了本研究最根本之缘起。

## 一、福建宋元建筑之研究

研究范围体现于时空两方面的限定，其中福建体现地域的概念，其地理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1949年9月行政区划通令中的辖区，相关省域内市县行政划分则以2004年底状况为准（图1-1）。<sup>2</sup>

宋元时期，以王朝更替为准，时间当为上迄赵氏立国，下至朱氏明朝立国。不过福建一地，直到978年，宋朝统治方才确立。此外，福建在唐末五代时期为宋元时期奠定了发展基础，而后以和平方式并入宋朝版图，五代闽国的如佛教及海交等诸多政策基本延续下来。是故，福建宋元文化发展时段当从唐乾宁四年（897年）唐朝廷升福州为威武军开始，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平定八闽。<sup>3</sup>在该时段内，五代与北宋是福建经济文化发展阶段，南宋是高峰期，而元代则是高峰之后的衰退。<sup>4</sup>

在东亚相关地域，日本列岛的中世镰仓时期（1184~1332年）、韩国高丽王朝（918~1392年）都涵盖于此时段中，可一并概称为10~14世纪。

### 1. 福建作为文化研究单元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此为“福建”之名首次见于历史文献，福建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体系而存在。<sup>5</sup>从此开始至近代，虽曾有内部割据分裂以及作为整体划归其他行政区划的时候，然而时间皆不长，总体上是作为完整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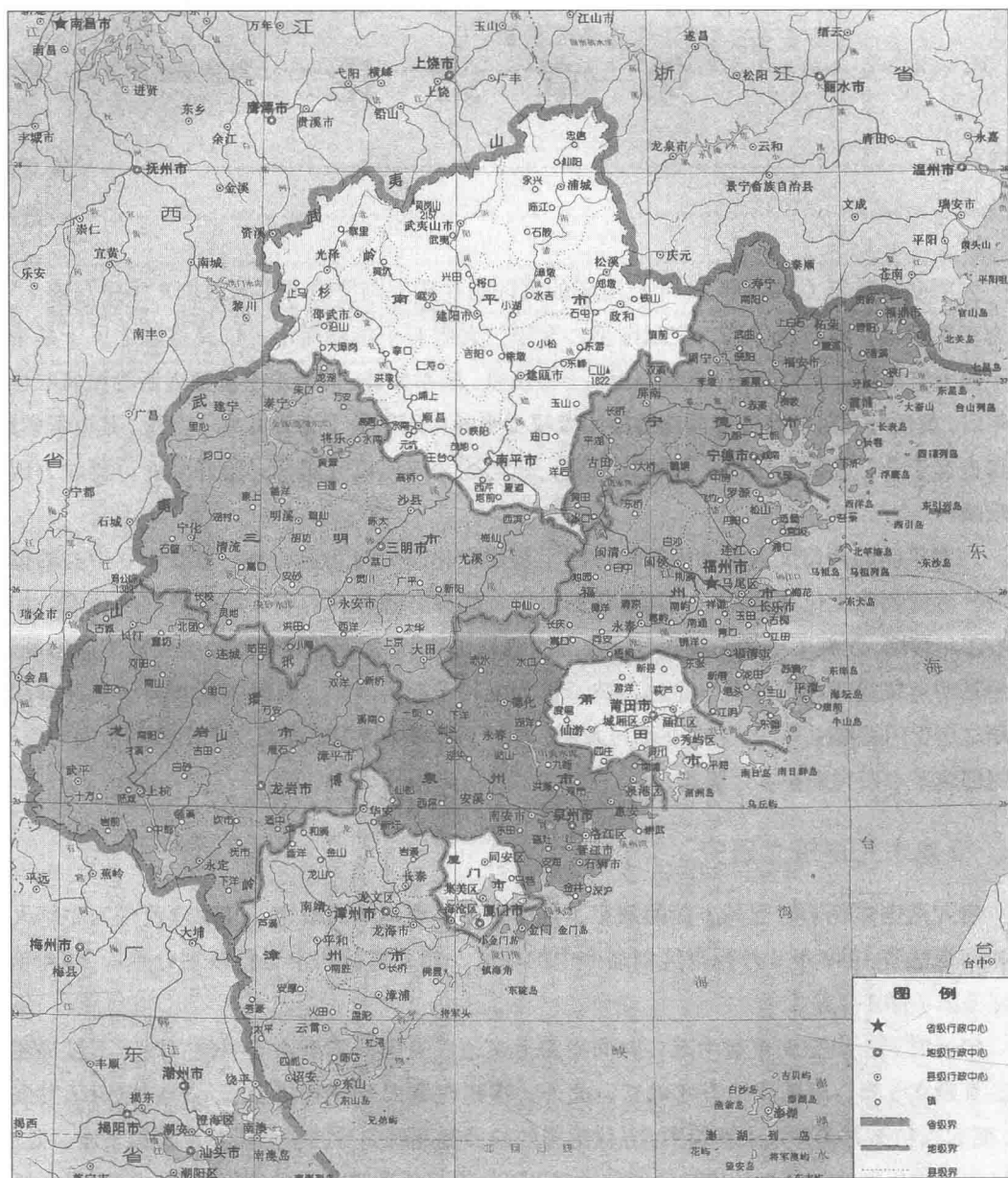


图 1-1 福建省行政区划图

行政区划的时期为多。地理上的福建，区域性特征亦十分明显，三面环山，东面临海，境内主要河流基本自成体系，于境内发源，境内入海，高山围护，河流不出境，阻碍了陆路及内陆水运与相邻省份的顺畅联络。行政上长期自成一体、地理上较独立的区域特征，二者相辅相成，促成福建作为整体文化单元渐渐进入历史的范畴。早在东晋孝武帝时就有晋安郡太守陶夔撰《闽中记》，后来又有萧梁时顾野王撰《建安地记》以及唐林谿撰、宋林世程续撰的《闽中记》，这些久已散佚的志书可谓搭建福建整体文化视角的先声，到了明代，黄仲昭编撰完成《八闽通志》及近代修成卷帙浩繁的《福建通纪》，福建文化视为整体研究对象渐成定型。

以福建作为一文化单元整体加以研究，也是近当代诸如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学等研究习用的思路，该学术视野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业已通过大量相关论著实践<sup>6</sup>，而其契合行政及地理等语境的关联性亦体现于相关研究中。<sup>7</sup>从建筑史学界相关论著看，福建作为整体研究单元亦为常见通例，即对福建建筑的整体性有基本共识<sup>8</sup>，“福建建筑”作为研究概念已然不甚陌生，而如“闽粤建筑”、“闽台建筑”等突破福建省域的研究范畴，亦未曾割裂福建省域的整体性，同样，民居研究领域的区系划分，也基本是在省域整体观察基础上的深化。

历史地理研究表明，从先秦一直到晚清，“闽”、“闽越”、“闽中”就被单独指称该区域，此般“区域观念”的成熟，又与区域经济的相对独立、高层政区的长期稳定密切相关。<sup>9</sup>

## 2. 福建传统建筑研究回顾

目前所见，最早应用科学方法对福建建筑展开研究的论文，是德国人艾克（Gustav Ecke）先生所作，研究福清石塔的《福清二石塔》一文，经梁思成先生翻译后，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艾克先生早先即已关注福建传统建筑，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福建进行田野调查，为福建建筑留下了较早的一批珍贵资料图片。<sup>10</sup>此后，有文物管理部门工作者就考察发现的福州华林寺、莆田玄妙观三清殿等年代久远的木构实物撰写调研报告，公开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中，成为该批木构最早的科学记录，虽简略但价值不菲。<sup>11</sup>到20世纪50~60年代，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等部门开展了民居调研活动，是对于福建建筑较全面的科学研究，参加人员有傅熹年、张步騫等先生，历时两年有余。该时段主要的成果，因时局扰动，有关福建部分多数未能存世（图1-2），幸甚尚有《甘露庵》后来发表，此为后来学者能见到的甘露庵唯一测绘资料。<sup>12</sup>80年代以后，除了民居研究方面的成果持续面世以外，有关福建木构架、石塔等研究亦屡见著录<sup>13</sup>，其中对较为重要的木构的研究也相继成文发表，早期如《福州华林寺大殿》《莆田玄妙观三清殿》《泉州古建筑》等成果，为福建建筑研究发展渐次夯实学术基础的开端。不过，与北方山西省、南方江南地区的古建筑研究成果相比，在资料的积累及深度、论著的丰厚方面，尚有不小的差距，如至今为止，福建尚未有一部相关木构实例的修理或测绘报告。任重道远，类似



图1-2 20世纪60年代福建调查劫后稿

的调研工作仍在持续，对建筑实物案例的分析积累，更多实例调查报告的发表，也使得学界有可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福建建筑的相关情况。<sup>14</sup>

若以研究分析方法的渐进看，福建建筑相关研究似有从采风式调查的资料收集到深入探寻的研究分析的历程。早期福建建筑主要是作为建构中国建筑历史整体体系中的环节，如在20世纪60年代成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列举了泉州东西石塔、泉州洛阳桥、泉州清净寺、闽西民居等福建典型案例，作为不同时代成就及各式建筑类型的例证，确立与推介了福建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的定位，但对福建古建筑自身建筑演变规律则不作深入分析。此种犹若“案例拼图”的研究模式，可能会使得理解福建建筑时，仅了解少数优秀代表案例，从而缺少全面的了解，也进而忽略福建整体建筑演进的独特轨迹及规律。<sup>15</sup>嗣后，福建建筑研究不断深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研究者日益增多，尤其是地方高校参与其中后，针对更多案例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sup>16</sup>，研究方法相应多样化<sup>17</sup>，研究对象涉及更全面<sup>18</sup>，学术视野也更为广阔。最反映此般发展的典型者当数方拥先生长期研究后的系列成果，如针对福建闽南木构架的样式分类，虽立足已有的北方分类体系，但亦有注意闽南的独特性，并以诸如“完型现象”对福建建筑的样式滞后现象（相对于北方的发展轨迹）作理论上的归纳，并有了探寻福建建筑自有规律的努力。

学术视野开拓上，首推1984年傅熹年先生的《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sup>19</sup>，以实物案例分析为立足点，对福建建筑与日本镰仓时期大佛样<sup>20</sup>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了翔实的样式考证。此后，有张十庆先生的《以样式比较看福建地方建筑与朝鲜柱心包建筑的源流关系》<sup>21</sup>，延续借鉴上述思路，搭建了福建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建筑样式联系。如此，以福建建筑作为专项研究主体，而以福建为海上交通线重要环节的历史存在作为背景，在北方主流建筑演变研究中，在“礼失求诸野”模式的补充案例库之外，福建古建筑新确立了作为影响东亚其他地域建筑发展的源头的定位，被赋予了新的研究特质，虽然这可能仅仅只是部分恢复历史真实而已。<sup>22</sup>

海外学者出版的著录中，福建建筑较早出现在一些图录画册中，如常盘大定等先生主编的《支那文化史迹》<sup>23</sup>第四辑，即有收录福建建筑于“华南卷”中，不过仅有厦门南普陀一例，且未作过多分析，尚处于简陋阶段。嗣后，日本学者持续调查福建建筑，并有系列调研报告发布，较为典型的有茂木计一郎的福建民居调研以及村上泰昭等人的福建石塔调研、杉野丞的木构建筑调研系列<sup>24</sup>，皆为重要的基础持续积累。在继续深化调研工作的同时<sup>25</sup>，业已有重要的成果问世，太田博太郎先生于20世纪中期研究日本列岛大佛样建筑时，根据丰富的文献及实物样式线索，极有见地地注意到了大佛样与福建建筑的关系。<sup>26</sup>而后，娴于朝鲜半岛建筑的杉山信三先生<sup>27</sup>，于1984年出版了《韩国的中世建筑》，通过样式比较与文献论证揭示了朝鲜半岛建筑与中国大陆的联系，福建建筑是为重要的源头，这些将福建放置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线路中的思考，赋予了福建建筑研究新生一般的灵性，该学术思路也成为以后讨论福建建筑的必然功课之一。

相对而言，朝鲜半岛的建筑历史研究<sup>28</sup>，或许囿于相关文献的缺位，对朝鲜半岛建筑与

福建建筑较为后知后觉,在金东贤《韩国古建筑断章》、张庆浩《韩国传统建筑》等经典研究中,都较少对该问题进行探究。如此并不表示半岛与大陆之间的建筑关联不受关注,如韩东洙先生,其博士论文即致力于建构中韩两国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sup>29</sup>不过,韩国学界在分析半岛实例之时,更多关注与北方的关系,最常见的比较是浮石寺无量寿殿与山西佛光寺、凤停寺极乐殿与南禅寺对应,再展开相应的比较,似乎更为注重“最古老遗构”的对等关系。<sup>30</sup>近来研究思路则略有变化,如柳成龙有关柱心包的博士论文<sup>31</sup>,其关联对象已经涉及了南方部分案例,并有专章讨论福建华林寺大殿等相关案例,以此作为柱心包发展的参照。不过,同时也有研究<sup>32</sup>力图通过建筑构造样式的区别,揭示半岛建筑的独特性,进而反思杉山信三等前辈建构的学术关联。与日本列岛将福建建筑作为大佛样建筑影响因素之一相比,朝鲜半岛对福建建筑与柱心包的关系,尚在柱心包的自立与接受传播的平衡方面存有动摇与反复。<sup>33</sup>

### 3. 福建宋元时期的相关概况

宋代时期,张全真有言:“睽昔瓯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sup>34</sup>,以描述当时的福州。元代,有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将泉州断为“世界最大港之一”。<sup>35</sup>在这两处对福建域内两座发达城市的繁华礼赞之间,就是今日历史学家所称:福建历史上的“黄金朝代”——宋元时期。<sup>36</sup>

福建宋元时期,文化的繁华与灿烂奠基于唐末移民入闽,缘于统治者的重视及行政地位的提高,受益于资源开发及经济发达,尤其是成为经济支柱的海外贸易,影响尤著。<sup>37</sup>其表现为文化大儒群星闪耀、闽士著录名动天下、科举盛况层出不穷、文庙书院兴盛星罗、书籍雕印中心成型,同时佛教寺院棋布全域、高僧大德屡见史册、佛经巨藏功成双璧<sup>38</sup>,令人叹为观止。相关的研究经由学者贤达经年努力,业已经营成伟岸之宏构,令人仰视,成为后学晚辈可资采撷之文献宝藏。若以本研究所关注,则主要有以下三点可谓研究之基石:其一,福建宋元时期建筑发展概况,尤其是文献记录方面;其二,福建建筑与东亚其他地域之间的交通情况(图1-3);其三,福建海商及僧侣的活动。三者,一为建筑技术外传之源头,一为外传之线路,一为传播的媒介,缺一不可。

据文献记载,五代闽国时期,进行过相当规模的建设,初期主要是寺庙,据《三山志》“王氏雅重佛法,增闽僧寺凡三百六十七”,同书七公廨类刊载,“闽之浮屠,始于萧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铎峻相望”于福州天际,泉州的王审邦亦“崇奉上善之因,佛刹梵宫,桥梁道路,舍财建修,日丽飞鹰霞槛,实冠诸邦”;后期则有闽国宫殿建设。<sup>39</sup>纳土宋朝以降,寺院建设依然兴盛,据《三山志》卷二十三“寺观类”称,福州一地寺院“庆历中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绍兴以来止一千五百二十三,今州籍县申犹一千五百四”,数目惊人。故宋代谢泌有诗咏福州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支灯”,而且寺院建筑精美无比,如曾巩所云:“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sup>40</sup>宫殿今日荡然无踪,不过其建造活动以及寺院道观祠庙的兴盛,无疑可促进建筑技术进步发达,营建组织成长,工匠艺人成熟。

试举相对复杂的木塔建造为例,福建一地,南朝普通二年(521年)建福州定慧塔,为九层木构;至迟完成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福州寿山塔,为七层木构;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的福州神光塔,为七层八边形木塔;泉州于咸通六年(865年)建成五级木构的镇国塔,仁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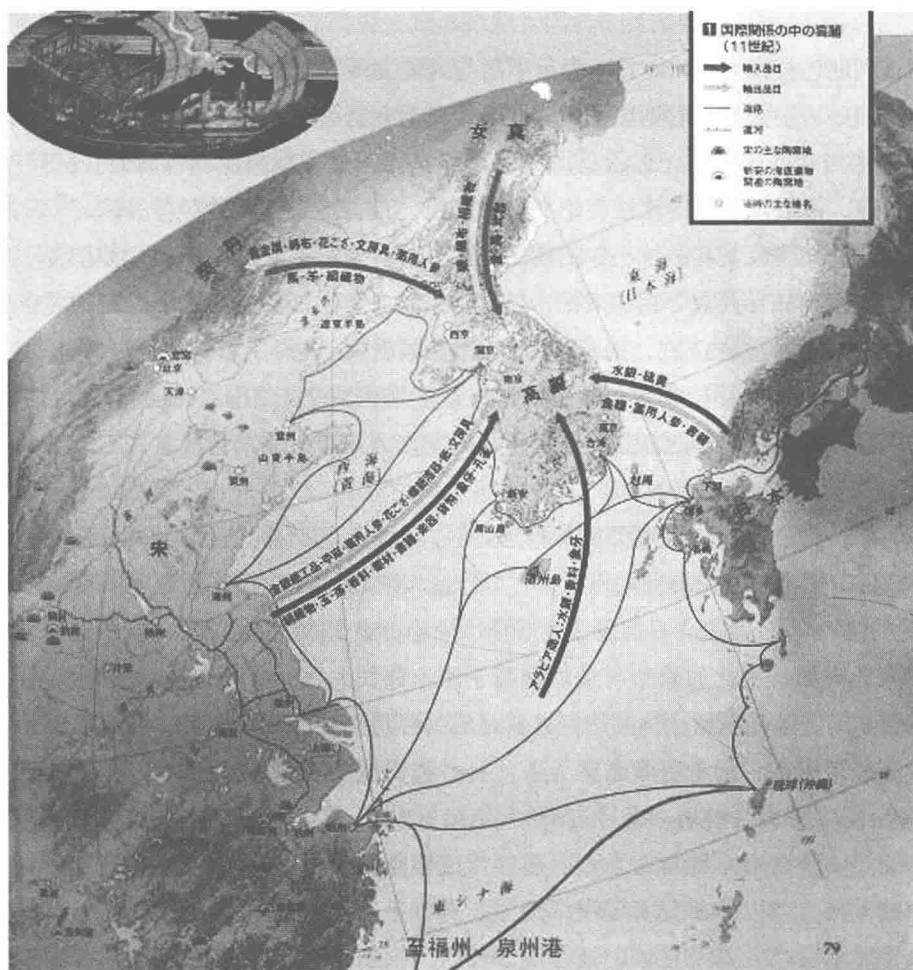


图 1-3 福建与东亚海交简图

塔建于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年），为七级木构。五代期间，福州城内还有七层崇庆塔、育王塔等木塔。此外，唐天祐元年（904年），王审知的福州定光塔系内砖外木的七层八角塔，“内甃以砖，凡四十万口，外构以木，盖百其巧，七层八面……方七十有七尺，高二百尺，相轮之四十尺”，建设中“琢文石以为轩，雕修虹以为梁”。<sup>41</sup> 福州的雪峰寺的僧侣宗一，“建毗庐阁，安贮藏经，规范雄伟，它所营立皆称是”。<sup>42</sup> 此般娴于木作多层建筑技能的事例，表明了唐末五代福建一地建筑技术的发达与先进，此亦为随后的宋元建筑发展之坚实基础，如开元寺双塔，都经历了木塔、砖塔到仿木石塔的过程，现今所见惊人的仿木水准，自当得益于木构原型的高度发达。<sup>43</sup> 结合斯时遗物所反映的精巧与成熟以及建筑样式上的诸多独特性，有理由相信：唐末五代到宋，福建的地方建筑体系已然确立，地方特色已然形成。<sup>44</sup>

历史学家已然洞察：古代福建历史上最发达的阶段，既是海上贸易最受鼓励，如五代王氏有“招宝侍郎”、南唐留氏闽南的“专务客”到宋设置“泉州市舶司”<sup>45</sup>，也是海上交通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可证于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群，亦可见于时人赵汝适的论著中。赵汝适《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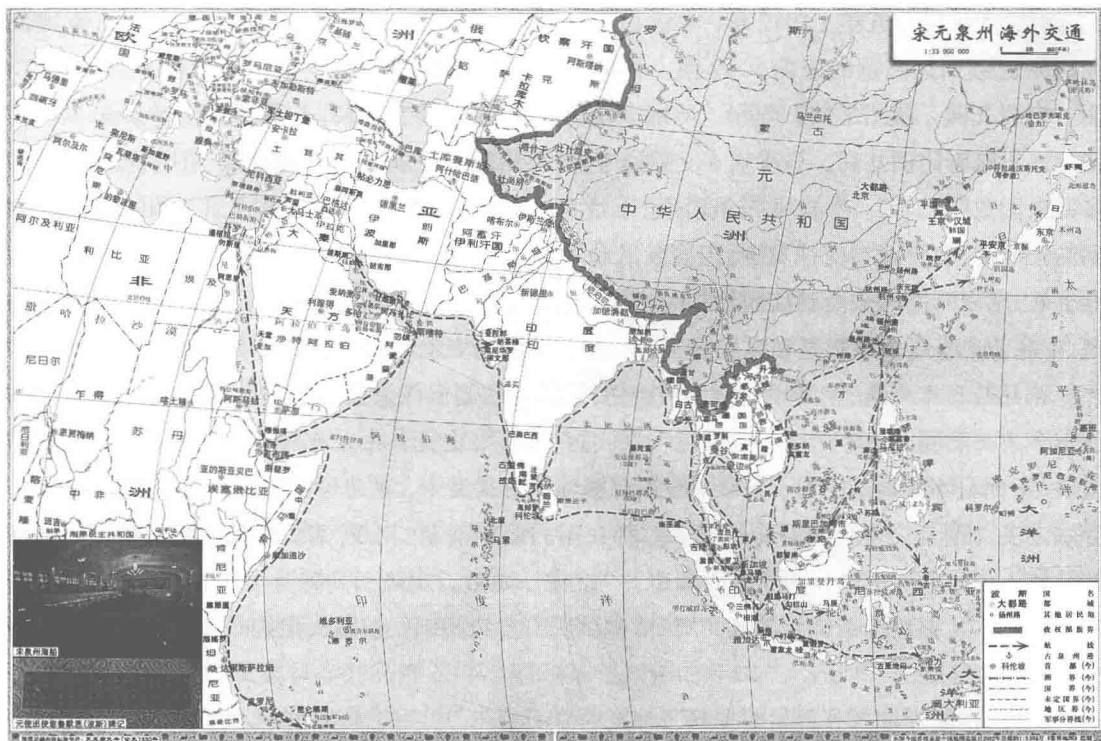


图 1-4 福建泉州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图

蕃志》中记载了当时与泉州港有贸易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图 1-4), 分布于东亚、南亚、西亚及东非, 其中亦包含福建与东亚的日本、高丽交流的线索, 是福建对外交流的重要环节, 亦为本研究尤为关注者。<sup>46</sup>

福建与日本的交流, 最早见于文献(日本文献《大唐和上东征记》)者为唐天宝十三年(754 年)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鉴真赴日。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 日本遣唐使团因暴风漂流至福州长溪县, 成员中有空海等人, 随后日本使团从福建前往长安。唐大中七年(853 年), 日僧圆珍来福建, 在福州开元寺学习, 后离开福建前往参拜天台山, 归国开创天台宗寺门派, 受赐“智证大师”称号。五代王氏政权倾力于海外贸易, 当会与日本有联系, 不过相关文献尚缺。到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 年), 有建州海商漂至日本群岛, 在日生活数年后归国(《宋史·日本传》)。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秋, 福州商客陈文祐从日本归国, 次年又赴日。宋天圣六年(1028 年)九月, 福州商客再次赴日, 见载于日本文献。宋熙宁元年(1068 年), 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 于熙宁三年(1070 年)献佛像给大宰府。熙宁五年(1072 年), 日僧成寻随中国商舶来华, 所著《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 “当时船头有三人, 一为南雄人, 一为福州人, 一为泉州人。”<sup>47</sup>

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 唐末即有零星记录, 史载闽国和新罗国十分友好, 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 新罗国使者曾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 而新罗国人, 有“(裴长史)慕华来归, 居之建州城中”; 入闽的光州人氏, 在王潮当福建军政时, 有王彦英者, “挈家浮海奔新罗”。到

北宋时,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高丽显宗三年),南楚人陆世宁至丽,献方物为嚆矢后,《高丽史》记载到达高丽的宋商共87回,依据有记载客商出航地的23回中,泉州8回,广南4回,台州3回,福州2回,明州、两浙、江南、南楚各1回,另有未明确出航地者66回,可知福建出航者比例甚高。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北宋末期,“(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sup>48</sup>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中也提到:“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sup>49</sup>到南宋一朝,官方政治交往见少,但商人活动一直活泼,同时,商人有时兼有政治使命<sup>50</sup>,据《高丽史》,南宋时期,宋商到高丽的次数达31次,一次到高丽的人数,最少1人,最多时达335人。《高丽史》所载主要是和高丽国王有关者,另外国史不载的贸易活动应当更多。<sup>51</sup>

福建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交流的密切,还体现在僧侣往来上,如福州安国寺玄沙师备,“馆徒常千人,高丽、日本诸僧亦有至者”<sup>52</sup>,普济《五灯会元》中,亦载有多位在福建的高丽僧人事<sup>53</sup>,而日本列岛的空海、圆珍亦曾涉足福建。五代及宋,福建可谓国内佛教最发达的区域,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之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有所谓“寺院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sup>54</sup>之说,是故,能吸引列岛及半岛的僧侣前来<sup>55</sup>,有新罗僧侣亦从福建携带佛经归国,“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sup>56</sup>

此外,福建一地海外贸易成长起了本地的海商集团,是中国其他港口少见的<sup>57</sup>,苏轼就曾奏:“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sup>58</sup>熙宁三年(1070年),高丽上表求医药画塑人员,宋廷转饬福建转运使罗拯,代向福建招募<sup>59</sup>,且对于闽人海外贸易至高丽者,高丽王朝亦“秘试其所能,诱以禄仕”,说明闽商中当有兼善其他技能者。

要之,福建五代至元时期的发达阶段,正是海外贸易发达、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时期,而在统治者的信仰倡导下,佛教兴盛、高僧精进,佛教文化具有影响力,寺院建筑精雕细琢,相应地,地方建筑工艺、技术得到提升,而由福建海商们开拓而成的海上交通路线,又牵绾起福建与东亚其他地区的关联。正是在如上诸多各为成因又互为结果的文化现象环环相扣的综合推动下以及海上孔道中闽商的忙碌、僧侣的虔诚等,使福建建筑走上了东亚宋元时期建筑文化的舞台。

## 二、东亚视野的成型与深入

所谓东亚的视野,就是日本学者堀敏一所说“把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结构的历史世界来把握”的研究视角、思维和方法。<sup>60</sup>

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其地理上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主要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组成的东北亚地区,广义者则再包括东南亚的半岛与海岛诸国。<sup>61</sup>古代东亚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概念<sup>62</sup>,各国(地区)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地区表现出内聚力和文化的的影响力,如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几乎通行于上述所有地域,在天文历法、政法体制等方面存有诸多共通之处。建筑文化相应亦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建筑文化圈。”<sup>63</sup>而在东亚文化研究中,中国、朝鲜及日本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无论是在盛唐阶段,抑或在宋元时期,都作为文化核

心区域，故本书中亦将较多关注上述三地。

### 1. 东亚视野之回顾

东亚视野是梁启超“亚洲的中国”历史观的实践之一<sup>64</sup>，已然是东亚诸国，尤其是中、日、韩学者的共识了，相关研究汗牛充栋，硕果累累。

就与建筑历史相关者，东亚视野的实践，现今已知国内最早涉及者，当以刘敦桢先生《大壮室笔记》中推测朝鲜宫殿可能是中国古代宫殿“复道”之流裔<sup>65</sup>为风气较先者。嗣后力行推广该研究方向者，有郭湖生先生，以建构东方建筑研究框架为目标，不但指导博士生撰写相关研究，并有《东亚建筑研究的现状与前瞻》<sup>66</sup>，推广研究构想及理念。在郭先生指导下，有张十庆、杨昌鸣与常青诸位先生分别完成东方建筑的子课题研究：中日大木技术、东南亚建筑文化、西亚文化的东来，为东亚建筑的深入研究搭建相应的学术基础及研究参考之范式。以中日建筑技术交流为起点，张十庆先生在东亚建筑后续研究中，研究地域亦涉及朝鲜半岛，研究时段也自建筑文化第一波东传高峰的唐代延续至第二波以江南建筑文化为源流的宋代，关注领域从造园文化、建筑律令制度、建筑样式扩展到设计体系等领域，推进东亚建筑研究渐次深入，如以中国大陆宋代至清的材分制度与斗口制度变化轨迹，作为东亚相应设计技术演变的参考标尺，反思日本列岛禅宗样<sup>67</sup>建筑某些案例的年代<sup>68</sup>。同时，张十庆先生结合研究所得，整理了东亚建筑体系之定义<sup>69</sup>，是目前有关东亚建筑研究较清晰的学术构架之整理。

同时，建筑历史的相关研究亦是精彩纷呈、值得注意，其中较重要者，如王仲殊先生的东亚都城制度的研究、宿白先生的东亚寺院伽蓝布局分析以及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东亚城市的系列研究<sup>70</sup>，都是在东亚整体史观下的高明实践，是建筑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

日本列岛的建筑历史研究中，较早即已经注意与中国之关系。早期建筑史学大家对同属东亚的中国建筑、朝鲜半岛建筑、唐代时期的渤海国建筑即有加关注且不乏卓识高见<sup>71</sup>，研究中亦多见以联系的观点看待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等不同地域发生的建筑现象。<sup>72</sup>饭田须贺斯先生著录《中国建筑の日本建筑に及ぼせる影响について》<sup>73</sup>，揭示日本建筑案例中与中国大陆相同或相近的样式做法，田中淡先生讨论“贯”在日本中世的出现，联系到中国唐代壁画墓所表现的重楣以及杉山信三在《朝鲜中世的建筑》中搭建了福建建筑与高丽建筑的关联等，都是在东亚整体联系观察下的分析。

### 2. 福建建筑与东亚之研究回顾

德国人艾克先生，写成《石建“亭塔”之结构研究》，发表于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第一卷第二期（1935年），最先提出了福建建筑与天竺样（即后期所称大佛样）之间的关系。梁思成先生读后撰有书评<sup>74</sup>，对艾克先生观察样式时的失误多加指正，如艾克先生所描述泉州独有样式者，往往亦可见于他处，并认为在泉州塔与日本天竺样之间实在找不出特殊牵连的线索来。不过，随着对大佛样建筑以及福建建筑的了解更加深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华林寺、玄妙观的相继发现，大佛样与福建建筑之间的联系渐渐明朗，到1984年，傅熹年先生刊发文章，论述了福建与镰仓大佛样建筑之间的源流关联。嗣后的研究，如方拥先生讨论福建的满置斗做法、张十庆先生的福建与朝鲜半岛之建筑样式比较研究、曹春平先生分析闽南建筑构件名



物时以及山川均先生的中日石造技术交流研究，将福建建筑放诸东亚建筑文化版图上，已然相当自然而娴熟。<sup>75</sup>

### 3. 东亚视角的福建建筑研究

要之，整体的、联系的、历史的地域建筑观，是东亚视野中最重要的核心。唯有整体，方能确立东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而是否具有联系，历史的分析至关重要；而唯有历史地联系事实，方能把各次级地域视为相对整体的东亚地域之构成。东亚视角的福建宋元建筑研究，其研究范式实可阐释为：海外贸易及佛教文化路线等历史存在，使得福建成为宋元时期东亚整体文化版图组成之一，而福建宋元时期的建筑技术亦融汇其中，与日本列岛大佛样及朝鲜半岛柱心包建筑存有源流关系，辅于文献记录、海交路线的廓清等佐证，通过建筑遗物样式的甄别与比较，重新梳理与探寻福建建筑与大佛样、柱心包之间关联的历史存在，以充实对福建宋元建筑的把握，并加深对宋元时期东亚建筑的理解。

## 三、建筑样式分析方法探讨

先前诸多研究东亚建筑文化交流的论著范例中，大量应用了建筑样式分析方法，概因样式是最直观的建筑要素之一，而样式因为直接表现了建构思维、工匠工艺、材料审美、工具等，成为追寻建筑源流最直观的线索，尤其在流动性较弱的古代社会。本节将借助已有成果，就建筑样式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及分析方法等，作简略梳理。

### 1. 建筑样式

“建筑样式”一词，在建筑历史研究领域，虽较为常用，然而其具体定义却甚是模糊。《大百科全书》的“建筑城规园林卷”中，即未见收录该词条。参考《汉语大词典》，解释样式（style）一词的两层含义：“式样，形式<sup>76</sup>；指文艺作品的体裁，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sup>77</sup>”，大致可以了解，建筑样式的含义与建筑式样或建筑形式相近。

建筑样式，核心内容为“样”，古代文献如日本《令集解》“营缮令”中定义为“谓样者，形制法式也”，当与中国唐宋时期“样”的概念一致，指古代建筑、绘画、雕刻及工艺等造型上的蓝图、底本或模型。建筑文献中的“塔样”、“立样”、“侧样”、“图样”、“样房”、“样式雷”，概皆有形制法式之意。<sup>78</sup>与早先的样式或有的“样之形制法式”相对注重作为参照系之意，现今建筑样式的研究对象，不仅针对蓝图、底本等，更是针对所有研究设定选取的对象，研究内容主要是对象的形态、形式等。如果参照梁思成先生称《营造法式》为“文法书”的思路，则建筑样式的研究对象，大致框定为“词汇”一类，即组成建筑物的各要素。

相对而言，同为研究古代建筑名物相关形式的表述，日本列岛较多用“样式”，如关野贞先生《支那碑碣的样式》<sup>79</sup>，而中国学者多用“式样”，如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sup>80</sup>，其实两者的含义大致相当。常与建筑样式交叉使用的概念还有“建筑形制”，除了两者共有的建筑形式部分外，相对而言，后者隐含有次序、制度、规模方面的考量，而建筑样式偏向建构思维、建造技术、工匠做法、材料感、装饰取向的辨别。